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意识形态论

俞吾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25 周年精选丛书

意识形态论

俞吾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识形态论 / 俞吾金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25 周年精选丛书)

ISBN 978-7-208-12347-2

I. ①意… II. ①俞… III. ①意识形态—研究 IV. ①B0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8151 号

责任编辑 于力平

•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25 周年精选丛书 •

意识形态论

俞吾金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2.25 插页 6 字数 327,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347-2/B.1074

定价 58.00 元

意识形态论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25 周年精选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 李 琪

副主任 沈国明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为松 王兴康 王国平 丛树海 李友梅

陈 昕 陈克宏 季桂保 张民选 何勤华

林尚立 童世骏 潘世伟

总序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徐麟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成立至今已有 25 年了。今天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是基金 25 年来资助出版的 700 余部学术著作中的精华,集中反映了上海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工作 25 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 25 年来的发展历程。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成立于 1989 年,旨在缓解当时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出版难,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人才流失的问题。基金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和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给予出版资助。1998 年起,为了支持和鼓励青年理论社科人才的成长,又设立博士文库出版资助系列,对优秀博士论文给予出版资助。至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博士文库三大出版资助系列。

在 25 年的发展历程中,基金资助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引导、鼓励和扶持广大理论社科工作者投身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培养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5 年间,基金还资助出版了一大批聚焦我国和上海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重大现实问题的论著,为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同时,基金还资助出版了一批基础性较强、具有文化积累和学术

积淀价值的专著,对于学术的传承、文化的延续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5年来,出版资助工作团结和凝聚起了一大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力促进了上海理论社科队伍建设,有效提升了上海理论社科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申请资助者中,既有耄耋之年的学界泰斗,也有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坚力量,更有与改革开放同年龄的青年翘楚。此外,一批又一批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出版资助的书稿推荐及评审工作,对这项工作给予了极大支持和高度认可。可以说,经过25年的发展和积淀,出版资助已成为团结凝聚上海理论工作者、培育上海学术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此次汇编出版25周年精选丛书,既是对基金成立25周年的纪念,也是对25年来资助出版著作的一次巡礼。更为重要的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面向未来、开拓创新、更上层楼,使这一传统学术品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挥对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导向作用、服务作用和促进作用。哲学社会科学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座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丛书的出版,在展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辈学人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同时,激励后来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创作出更多代表上海学术水准、体现上海学人风采的传世力作,为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乃至我国国家软实力的增强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的同时,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国改革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解释和回答。这是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新要求、赋予的新使命。哲学社会科学界能否承担起这一光荣使命,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不仅关系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关系到两个“百年目标”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希望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能在以往25年所奠定的良

好基础之上,继续引导和支持广大理论工作者,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推出一批既有重要学术价值、又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学术成果,为上海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服务,为全面深化改革、早日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

是为序。

2014年6月

序 I

辛敬良 余源培

“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而又敏感的理论课题，我国理论界对此尚缺乏系统的研究。俞吾金同志选定《意识形态论》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表现出在理论上不畏艰险的勇气。

据我们所知，他早就打算撰写这篇论文，并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他去法兰克福大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据地）进修期间，又搜集到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丰富资料，并形成了论文的构思。回国后，虽曾一度犹豫过，最后还是毅然下决心撰写，直至完成。经过有关专家和答辩委员们的评阅，一致认为这是一篇高质量的博士论文，现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会赞助出版，我们为这位青年学者取得的成果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向他祝贺！

此书的主题是论述作为批判理论的唯物史观。作者认为，唯物史观批判理论的特点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它把“去意识形态之蔽”提到元批判的高度。去蔽之目的是为了澄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具体表现为历史性的先行澄明、总体性的先行澄明和实践性的先行澄明。由此指证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既是批判的、革命的，又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学说。在这个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哲学就是对意识形态的意识”、“哲学史就是意识意识形态的历史”的新界说，颇能发人思考。

这部著作内容涉及人类思想史的广阔领域,堪称得上是“博士”论文。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完整系统地考察了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从培根的“四假相”说,经过洛克和法国启蒙学者的不断强化的感觉论,托拉西正式提出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而黑格尔则用唯心主义的独特方式研究意识形态的发展,他将意识形态与异化直接结合起来。马克思经过费尔巴哈的媒介,又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把黑格尔以神秘方式表达出来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他引入托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加以扬弃,在这一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作者从哲学史的发展深入地考察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和特征之后,阐明了意识形态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是一定时期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总和,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价值观念体系,这就澄清了我国哲学教科书中长期将“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及其形式”相混淆的误解。与此同时,作者还指出,尽管社会上存在着文盲,却不会有意识形态之盲,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并受其支配。至于社会上有些人把意识形态看作只是知识分子的事情,或与知识分子有关的事情,那更是一种误会。

正因为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价值观念体系,所以它必然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此,本书广泛探讨了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与物化、异化和教化,与幻想,与合理性和合法性,与社会性格等各方面的关系,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显示出作者思考的广度和深度。

此书详细地考察了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传播史和演化史,特别重要的是对列宁、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的关系作了探讨。作者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意识形态”概念是在虚假性或否定性的意义上使用的,因为统治阶级的理论家总是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是全社会的普遍的利益,从而为本阶级统治制造幻想。虽然对于意识形态家来说这是不自觉的,但是只要阶级统治仍然是社会制度的形

式,这种情况是不会消失的。所以,马克思强调哲学的重要任务是要“去意识形态之蔽”。马克思的继承者列宁、毛泽东则不再笼统地谈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是直接地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对抗和斗争。列宁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工人队伍中的反映,因此必须从外面向工人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如果忽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教育,那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毛泽东更明确地强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指出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这种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同样强调共产党人在教育、道德、婚姻、家庭等观念上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因此,不管在表述的方式和角度上有着怎样的差别,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问题,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值得重视的是,列宁首先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科学的意识形态。

本书以相当多的篇幅对当代东西方学者,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代表性著作和观点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有分寸的评述。与此同时,还触及了不少现实性强而又敏感的问题,如斯大林问题、中国“文化大革命”问题等。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陈述自己的看法,颇有唯物主义者的勇气。

此书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指证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有巨大反作用的同时,澄明这种作用不是任意和无限的,而是有限度的,因为归根到底意识形态是围绕着经济发展的中轴线而波动的。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如果将意识形态斗争扩大化,提高到中心地位,那就会走向反面,不仅不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繁荣和发展,相反地会造成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实际结果正是如此。这一深刻的教训的积极意义就是促使我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而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我党的意识形态理论也随之走向成熟。

总之,这部著作内容丰富,议论精深,材料翔实,写作技巧上乘,表现

出作者长袖善舞，才华出众。不足之处是在历史和逻辑的结合方面略为逊色。目前，我国理论界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系统研究还很不够，我们相信俞吾金博士会更上一层楼，攀登新的高峰。

1992年3月15日

序 II

伊林·费切尔

放在我们面前的俞吾金博士的这部著作勾勒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史以及这一概念从它最初的奠基人弗兰西斯·培根到当代的变化。弗兰西斯·培根的“假相说(Idolenlehre)”是把“虚假的意识”、“错误的观念”归结为社会环境影响的最初的历史的尝试。为了获得科学的知识，人们应当摆脱四种假相，这四种假相是：1. “种族假相”，2. “洞穴假相”，3. “市场假相”，4. “剧场假相”。在培根那里，“种族假相”意味着一种知识的形成，这种知识是通过我们人的本性而产生出来的。我们的意识并不是一面反映宇宙的洁净的镜子，而是一面不平的、破碎的镜子。这种知识上的错误是不可能完全地被排除的，但是人们能够并应该估计到这种情况并进而避免做出急躁的判断。按照培根的看法，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错误的知识）也来自人们借以观察自然的工具（例如望远镜）。培根也论述到知识论的问题，这一问题后来被康德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精确的思考。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感觉的产物，而感觉材料又经过内在于人的知性范畴和直观形式的“加工”。这既表明了具有正确的认识方法的科学家之间在知识上的一致性，又限制了这种知识，因为我们只能达到“现象”的层面上，并不能知道其他的知识形式和居于现象背后的东西。在培根看来，人的精神由于其本性很容易把一种秩序和等同性赋予事物，但在自然中，许多事物是分离的，在形式上也是不相同的，人的

精神所发现的那种平行、适应和关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洞穴假相”乃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是我们不知不觉地从我们所从属的确定的民族和时代的传统中接受过来的。人们有一种适应于传统的倾向,他们仿佛置身于他们的“洞穴”之中,抵制并拒斥不一致的见解。“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也有类似的意义。通过相互间的交往,单个人适应了他的同胞的偏见和观点,不再能以批判的方式去检视这些偏见和观点。

在培根那里,意识形态的概念已经包含了后来被青年马克思首先加以发展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关系到“虚假的意识”问题;另一方面关系到产生这些“虚假的意识”的原因。在培根以及培根以前的思想家的文献中,人们发现,这些原因不仅是由感觉的欺骗引起的,而且也是由荒谬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引起的。我们也发现,在培根那里,意识形态概念的心理学方面的含义已受到了注意,正如培根所说的:“一个人倾向于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也正是他以前所相信的东西。”

按照培根的观点,知识理想和知识目的是随着人对外部自然界的支配而逐步提高的。“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的力量仅仅来自对实在的准确的洞见。

黑格尔的历史思维并不十分关注科学对自然界的支配,而是致力于对人类所经过的不同的意识阶段的说明。他把世界历史上不同民族所经历的不同的历史时代看作是人类的意识所经历过的同样多的阶段,在发展的目的地被达到之前,这些阶段必然是不充分的。这些不同时代的历史意识按自己的主题创造了不同的制度、文化的外在表现等等。没有一个个体能够超越这样的意识或者从这样的意识之中摆脱出来。只有当一个历史时代已经结束时,人们才能意识到它的原则并超越它。于是,一种新的世界历史的意识和一个新的时代便开始了。因此,在黑格尔那里,人们能够谈论“虚假的”,即以历史的方式相接替的意识,在这样的意识中,同时代人成长起来,并获得了自己的发展。在每一时代结束的时候,这种以时代为局限的意识都变成了“虚假的”意识并被“新的意识”所取代。

在培根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虚假的意识与社会的(历史的)条件之

间的联系,黑格尔则把历史变化的新原则引入到意识中。假定世界历史在当代的发展(即首先从奠基于法国革命成就的拿破仑的世界帝国开始)已经达到了它的确定的目的,黑格尔就能为他的“哲学”提出变成“智慧(Weisheit)”的要求。真正的知识(即智慧本身)是从对知识的纯粹的爱出发形成起来的,因此,人们能够以回顾的方式谈到早期的知识阶段和思维方式,而这些知识阶段和思维方式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即有限的因而不是不真实的东西,而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者的哲学则变成了卓越的智慧和“科学(Wissenschaft)”。

青年马克思也关涉到这种已经被历史化的意识形态概念。他最初称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是意识形态的,同时他还论述了以下的问题:1. “虚假的意识”;2. “以社会为条件的意识”;3. 在意识中,正如在现实中一样,对历史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观念或“精神”,而是物质的关系(社会秩序、社会地位等等)。因此,从内容上看,马克思引入了第三个规定,这一规定后来被称作意识形态。马克思最初是在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者(尤其是在批判的黑格尔主义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那里发现意识形态概念的。当黑格尔把历史称作“自由在意识中的进步”时,他已认定,各种宗教观念正是同时代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和基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成员一旦想象出上帝这个绝对者,他们的宗教就以颠倒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基督教的上帝形象达到了人性的高度,从而也被提升到更高的哲学阶段上。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如果一个文化上已经发展了的人是他的社会、国家(即“客观精神”)中的“主观精神”的话,那么这个“绝对者”就是“绝对精神”。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把上帝的形象看作是人的自我形象在天空中的投影,他由此而摈弃了黑格尔的上述见解。费尔巴哈试图通过如下的方式把人们从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即人们应当把已赋予上帝的“各种本性”重新赋予自己,重新占有自己。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正包含着从有限性中解放出来的人的各种本性。全能、全知和至善的上帝正是人的知识、能力(力量)和爱的绝对化。

在1844年出版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就德

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费尔巴哈已经完成了这一批判,但是现在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人们会把他们自己的最高的本性异化出去并把它们“投射”到一个彼岸的存在物上去?费尔巴哈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他完全像18世纪的启蒙学者们一样坚信,人们能够通过纯粹的意识上的启蒙,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来克服这种异化。马克思指出:“但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之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2〕}为了克服宗教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这个“颠倒了的世界”必须再被颠倒过来,变成一个与人的需要和能力相适应的“真实的”世界。马克思说:“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3〕}又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4〕}对于马克思说来,意识形态批判(Die Ideologiekritik)仅仅是第一个步骤,其目的是号召人们(后来他更具体地称之为“雇佣劳动者”)改变那种不断地生产着意识形态(幻想)的现实关系。

意识形态总是服务于这样的目的,即维护现存的关系(统治阶级的权力),要推翻这样的关系并消除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是很容易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马克思表述了下面这一重要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5〕}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意识形态)生产的资料。在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和准备以被动的方式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的统治阶级的其他成员之间的分工导致了这样的幻想,即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似乎是与物质关系无关的。随着科学技术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页。

〔2〕同上。

〔3〕同上书,第453页。

〔4〕同上。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

的进步和发展,随着一个新阶级的崛起(如欧洲资产阶级从16、17世纪以来的兴起),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革命思想”也出现在文化领域里,当新兴的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例如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时,这种“革命思想”才可能发展起来,但是,这种可以被预见的发展表明,新兴的阶级也急需把它的利益以尽可能“普遍的形式”伪装起来,以便用这种方式来获得该社会的观念上的领导权(正如后来安东尼·葛兰西所说的那样)。

因此,革命的市民阶层的出现,并不伴随着“一切权力归市民阶层”、“一切生产资料归市民阶层”的口号,而是伴随着对一切人都适用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要求。普遍存在的情况是,“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因此,革命的阶级总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而出现的,因为旧阶级的统治首先是被生产力的发展所摧毁的,所以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18世纪的资产阶级和现在的无产阶级事实上表达了一切非统治的阶级的共同利益。

卡尔·曼海姆已经区分了两种意识形式(Bewusstseinsformen):一种是走向没落的阶级的偏见,即“意识形态”(Ideologie);另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意识形式,即“乌托邦”(Utopie)。但是,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把这两种意识形式仅仅归结为有限的实在知识,并从“抽象的理智”出发,期待对部分现实有所认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达到一种综合。

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预见到了,随着阶级社会的终结,在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也必将终结。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再需要用普遍利益的幻想来掩盖相互之间不一致的特殊的利益,因为把“特殊利益”扮作普遍利益或把“普遍利益”扮作统治阶级的利益都不再是必要的了。到那时,观念也不再被想象为“统治的”观念,而自觉的和联合起来的人们将以非意识形态的(ideologiefrei)、科学的方式组织起共同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